

人工智能与人文专题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王 宁

摘 要：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由人工智能来做，原有的人力之过剩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一些大学不惜裁撤一些学科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丧失竞争力，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显然与建设一个和谐与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治国理念不相吻合，更无法实现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本文作者既热情拥抱科技，同时又坚守人文立场，认为对我们高校教师而言，主要任务依然是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而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好就是人，这样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应首先考虑科技与人文的融通，以便率先构建一个科技人文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作者看来，科技与人文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和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不同的方面主要在于，它所诉诸的并非一致性，而更是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但这二者的对话和共融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首先要构建一个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人文；科学技术；人文学科；对立与共融

当今这个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成就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ChatGPT 和 Sora 的横空出世更是令传统的人文学者始料不及。不仅今天从事文档编辑、文学写作和翻译的人的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取代，甚至由文生图的广告制作也大致可以由 Sora 代劳。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由人工智能来做，原有的人力之过剩便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最近我甚至在网上读到一篇哀叹“未来教师会大批失业”的文章，虽然这一哀叹未免过于夸张，但也不能不使我们正视这一情形：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一些大学出于节省经费等考虑不惜裁撤一些学科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显然与建设一个和谐

与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治国理念不相吻合,更无法实现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对策了。^①我作为一个热情拥抱科技同时又坚守人文立场的人文学者,尤其关注这些情形。但我认为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并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而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好就是人,这样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首先考虑科技与人文的通融,以便率先构建一个科技人文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科技与人文:从对立走向共融

要想推动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一直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还是这二者可以对话乃至达到共融的境地?我本人一贯倾向于后者,并且一直致力于实现这种共融和对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形。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使得那些长期习惯于关起门来做自己封闭式学问的人文学者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因而对科技的介入持一种抵制甚至敌对的态度。毋庸置疑,对科技和人工智能持抵制态度者主要是一些老派的人文学者,他们长期以来由于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范围十分狭窄的学问,甚至与本一级学科内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都很少交流。他们一直认为,“隔行如隔山”,殊不知如果将自己狭窄的学科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隔绝,是不可能做成大学问的。因此,难怪学界一直抱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各行各业的专家,而是缺少那些学贯中西能够在多个学科领域游刃有余纵横驰骋的大学者。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高校,同样在一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从事教学和研究、教授语言学的教师却对文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充耳不闻,也不去阅读文学作品,他们自认为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具有科学的成分,是真正的学问,而看不起

那些整天忙于阅读文学作品并跟进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教师。但恰恰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他们的研究首当其冲:大语言模型的诞生使他们作为个体研究者的作用相形见绌。而那些从事国别文学研究的教师甚至对非自己所学语言的文学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涉足语言学了。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啻为人文学科敲响了丧钟。这种悲观的看法使得本来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就不受重视的人文学科更是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之中。而广大中青年学者虽然感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来临比较突然,但由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对新生事物的异常敏感及探索欲望,很快就开始适应这一新鲜事物,自觉地将人工智能的一些先进方法和自己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并饶有兴致地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和研究。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的人文学者,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率先在中国学界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这个命题,并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更是尤为关注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研发的数据库 SSCI 和 A&HCI,并率先建议将其引进中国学界,作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标准之一。^②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新文科理念的提出更是使我义无反顾地致力于跨学科研究,而此

① 这方面可参阅我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试图就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伦理问题提出我的看法。王宁:《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及人文学术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现代出版》2024 年第 4 期; Wang Ning,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t GPT: Call for an Ethic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外国文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② 这方面可参阅王宁:《国际英文权威学术期刊评介及写作策略》,《中国研究生》2003 年第 5 期;王宁:《对人文社会科学现行学术评价系统的确认与辩护》,《学术研究》2006 年第 3 期;王宁:《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标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王宁:《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评价机制:超越 SSCI 和 A&HCI 的模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王宁:《再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及评价标准——兼论中国实施文科院士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 年第 3 期。

时的跨学科已经不止于人文学科内部的跨越,也未停留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和比较研究,而是要跨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甚至科学技术的界限。一方面运用当代高科技和人工智能手段从事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给过于主观的人文学术研究带入一些科技和量化的成分。我在这方面率先介绍爱思唯尔集团研发的评价机制,认为这至少可以用来评价一所高校或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当然这样做造成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人文学科也开始被逐步当作一门学术学科来看待,人文学科的评价也变得相对客观公正了。另一方面,人文学者通过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和对话也可以学到一些当今前沿的高科技知识,并在与科技人员的交流和对话中向他们灌输一些人文思想和文史知识,使他们得以审美地享用自己参与生产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成果,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人发明和发展更新的,因此人的因素依然是第一位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具有理性和人文情怀的人来掌控和驾驭,否则就会偏离发明这些新技术的科学家的初衷,甚至被人滥用。这样看来,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可以使其得以全面发展,因为我们无论生产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最终都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从而在国际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这方面而言,科技与人文的终极目标大致相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成果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科技和人文学者而言,首先就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通和对话,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我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科技与人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还是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达到共融的境地?在我看来,二者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和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也即二者首先在学科分类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别。科学(包括狭义的社会科学)所要探讨的是事物的一般规律,其研究成果具有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而技术则是科学之下的一个分

支,它与作为“道”的科学不属于一个层级,而是属于“术”的范畴,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技术才能达到先进的程度。而人文学科所针对的则是个体或民族、国家的一些独具特色的东西,对其的验证和评价因人而异,因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也即我们经常说的对文科成果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科学的一般规律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界定,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其成果可以被定量分析和评估而被接纳为科学学科,而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历史、哲学再加之艺术学科等,则由于其方法的殊异和评价的主观而被笼统地称为人文学科,并被排除在科学学科之外。过去沿袭下来的古典学和语文学也由于其鲜明的人文性质而被纳入人文学科的范围。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其次,科学与人文在思维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科学思维方法是由诸多方法组成的,包括数学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模型方法等,由于这些方法均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因此它具有较高的概括力和较大的适用范围,能够同时应用于不同的学科,并可经过实验的检验。这种方法的客观基础是科学研究对象和科学本身存在共同的属性与规律。我们经常说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指要尊重科学的内在规律去谋求发展,违反这一规律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正是由于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有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因此科学的评价机制也就相对客观并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得出。我们今天可以从诺贝尔奖的各种奖项的评选结果所产生的不同反响中见出这种差别:属于科学的奖项一般比较容易得到同行的公认,所产生的争议也不是很大;而属于人文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奖项——文学奖与和平奖,则往往会产生很大的争议和褒贬不一的评价,这就说明对这两种奖项获奖者的评价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并受制于意识形态,此外与评委的好恶和各自所持的评价标准和倾向也有很大的关系。

毋庸置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不同的方面主要在于,它所诉

诸的并非一致性,而更是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即无论是创造力,还是革新力,它的本质都是看创造者能否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和熟悉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不同的出发点,最终发现一个全新的东西。人文学者的创造往往就是要在一般人所认为的无用性中发现其可能的最大有用性,也即我们经常所说的“无用的有用性 or 大用”^①。所以掌握人文思维的方法就是要把人们从貌似“有用性”的现实中剥离,运用这些看似无用的人文思维,去发现我们实际上最有用和有大用的东西。与科学技术成果取决于团队攻关所不同的是,人文学术的成果往往是个人独立思考、著述的结晶。古今中外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人文思想家的著述大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但是却使成千上万的人受益。因此,当人文学科的成果从无用发展为有用时,它必定会产生一种无法估量的大用。

再者,科学技术与人文也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其一,一项科技成果是否有价值完全可以视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衡量;而重大的人文学术成果虽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它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一种象征资本,有时这种象征资本也能够间接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作为人文思想重要成果的儒学管理思想理念一经为新加坡的开国总理李光耀所掌握,就带来了新加坡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这个亚洲小国的繁荣。国内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也经常邀请一些人文学者给高管员工讲授人文类课程,使他们考虑问题不仅局限于眼下的需求,更着眼于未来可能的发展战略。其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术在某些方面都可以用量化的方法来评估。例如科睿唯安科技集团和爱思唯尔科技传媒集团每年都要发布全球高被引学者的榜单:前者的榜单只选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因此中国和西方的人文学者均不在其发布的高被引榜单内;而后者则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一级学科,并将其所属一级学科的学者按照其影响力指数作出排名,最后发布全球前 2% 的顶尖学者榜单。^②当然,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这个榜单仅说明中国人文学者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英文书刊

上的被引用率。而那些不能用英文著述的中国学者自然就不会被国际学界引证,更遑论产生世界性影响了。应该说,在评价一个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方面,量化的方法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是,对一个人文学者的学术水平以及他所产出的学术成果价值的全面评价,单靠量化的方法是无法完成的,依然有待于本学科同行的定性评价。当然,那些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的“民间文人”和“民间艺术家”则不在我们的评估视野和关注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科技与人文并非决然对立,它们有时也由于其具有的一些共性而可以沟通、交流,从而达到共融的境地。因此我们提出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是有一定依据的,同时也是必定可行的。

二、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要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使我们的国家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我们必须确保科技文明和精神(人文)文明同步发展。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应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作为一所以理工为主、文科有着后发优势和广泛国际性影响的综合性大

① 参阅王宁:《人文学科有“大用”(大家手笔)》,《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4日。

② 在202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国际传媒集团联合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年度影响力榜单中,我和聂珍钊、杨玲、尚必武以及张隆溪均名列其中。在这份榜单中,读者不难看出,我和尚必武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而且都在国内和国际学界获得殊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几位入选者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英文著述,并得到英语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引证,而更多的仅活跃于中国语境中并仅用中文发表著述的学者则未入选这个榜单。就在本文即将完成之际,2024年度的最新榜单又发布了,我本人和聂珍钊同时跻身全球2%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终身影响力榜单,跻身2024年度影响力榜单的除了我们两人外还有杨玲和孙艺风。

学,上海交通大学应该走在国内高校的前列。^①那么它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何处呢?

首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无非看它的两种实力:排在第一的固然是其硬实力,也即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科技的发达和先进程度以及国防力量的强大,没有这一硬实力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近一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欺凌的历史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因而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就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西学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文思想上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式启动,党中央和历届政府都把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主动请缨负责教育和科学技术,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教育和科技所占的比重极大地增加了。由于我们排除了一切干扰,中国于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一直在快速发展,直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一些学科的研究已达到世界一流。最近党和政府又开始强调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呢?它与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建成的现代化有何不同?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区别,我已在不同的场合作过一些论述,此处无需赘言。^②我这里只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是相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要依循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它在注重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欧美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只有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是可持续的,并可以为其他仍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所效法和学习。^③

现在我们来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情况。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其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结果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生产的转变,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以电力、内燃机的广泛应用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以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信息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结果是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1世纪,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正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可以说,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三次工业革命,并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仅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紧追慢赶地达到了与欧美

-
- ① 尽管当今流传各种大学排名,但是我认为2024年9月1日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发布的“中国人文社科最强校Top100”的排名比较客观公正,尤其注意到这些高校文科的国际影响: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一所以理工见长,具有文科后发优势并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文科排名国内第9。“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号:《重磅!中国人文社科“最强校”Top100,出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A1MjcwMA==&mid=2660160156&idx=1&sn=c433f9fd7f81bd8828413837dea422f1&chksm=bc6da096e99694845e8a39e9feef96ca742da7ecf82d88dd51139d43bd3682ed4d402ed6c681&scene=27, 2024年9月1日。
- ② 这方面可参阅王宁:《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王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双重进路与未来愿景》,《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王宁:《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本土资源和理论建构》,《全球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
- ③ 实际上,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早已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本人和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童世骏应邀出席了2010年11月17日至19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拉丁美洲科学院第23次学术会议,在会上就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作了长达一小时的主旨发言,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可见发展中国家确实想了解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经验教训。

发达国家基本同步的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前面。因此中国的高新技术现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和限制就不足为奇。因为它们预感到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其一家独大的格局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欧美发达国家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地消耗资源,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因而受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1962年9月27日,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编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遭受破坏的环境之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标志着人文学者开始登场进行干预。之后率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并迅速进入中国的文学生态批评通过文学写作和批评的方式向人们发出警醒:过度的发展已经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不堪重负,应该节约地球上现有的资源,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法生存和繁衍。中国虽然在现代化建设初期也以消耗资源、损坏环境为代价,但党和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宁可放慢发展的步子,也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这应该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地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只有一手抓科技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尽力保护环境,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得以持续。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学的近况吧。欧美国家虽然早已建成了现代化,但是它们往往一开始愿意拨出资金发展人文学科,致力于培养继承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博雅之士,甚至通过一些基金会的资助,选派文科教师到国外教授语言文化和人文课程,传播它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而一旦发生经济危机,首当其冲受到裁撤的就是人文学科,甚至连那些享有盛名的音乐学院也未能幸免。在中国的大学,我们虽然也不时地听到人文学科的教师抱怨校领导不重视文科,任意缩减文科科研经费等,但是就国家层面来看,每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艺术基金的立项数和经费支持的力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逐年增加。而对于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海外翻译和传播,国家更是斥资资助这些著作在

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实行院士制,不少国内顶尖大学设立了文科资深教授制度,教育部也率先在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试点评选文科一级教授,从而使那些学术成就斐然并具有广泛国内国际影响的杰出人文学者享受与理工科院士同等的待遇。这一切都说明,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在科技领域跻身国际前沿,同时也要在人文(文化)软实力方面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从而做到科技人文同步发展。

这样看来,既然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有着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坚持这一方向就是必须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 任重而道远

既然从中央到高校的领导都认识到发展人文学科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了呢?我认为万万不可如此乐观。

在今天的中国高校,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年一度的高考过后,青年学子及家长们便面临着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的难题: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且考分很高的考生,他们首选的是一些双一流大学的热门学科专业,诸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建筑和设计等,即使文科考生也首选属于社会科学的管理和金融,而较少报考传统的人文学科,致使一些国内顶尖大学的人文学科不得不减少录取新生的名额,或降低分数线录取次一等的考生。十多年前,英语专业也曾是考生们青睐的热门专业,但近几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英语技能,以及一些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大代表要求取消英语这一高考科目,英语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失去竞争力,一些高校甚至裁撤了英语专业,如此等等。这些因素使外语院校的生源质量大幅度下滑,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文史哲学学科了。青年学子们往往纠结于此:学习人文学科究竟有什么用,如果没有什么用的话为什么还要学它?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如果以经济效益

来衡量,人文学科确实对社会没有直接的用处,但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缺少人文学科,就意味着没有文化。而一所缺少人文学科和精神文化娱乐氛围的大学是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惜代价延揽一流人文学科人才的原因。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言,我曾在清华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亲眼所见并参与了该校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完全可以跻身国内文科前五名。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先后以兼职和全职教授的身份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并担任学院领导,更是亲眼所见并直接参与了上海交大的人文学科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从国内外大量数据来看,上海交大的人文学科已跻身国内前十名并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远胜国内一些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名校。因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发展文科有着天然的后发优势,而在国际化方面更是令那些以文理为主的高校望尘莫及。就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而言,这两所大学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世界一流的理工科,^①并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延揽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有着清醒的跨学科意识:人文学者熟练地掌握科技知识并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理工科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业余文艺和体育爱好,可以说具备了相当的人文素质,^②由他们率先发起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可以预言,人工智能的横

空出世在科技和人文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使二者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桥梁,同时,率先构建的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也将为我们全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一定的先声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22&ZD284)、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23ZD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宁,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拉美科学院院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

-
- ① 在爱思唯尔传媒集团发布的202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上,清华大学有482人名列其中,位居国内高校第一,上海交大有307人名列其中,位居国内高校第三。“ISE学术前沿”网易号:《496所高校机构5801人上榜!最新版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发布》,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D3V1T105363Q89.html%E3%80%82>,2024年3月28日。
- ② 据我所知,这两所以理工为主的综合性一流大学十分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除了校园内经常举行各种高级别的人文讲座外,还有自己的文艺演出剧团,经常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并获得大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举世瞩目的第33届夏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巴黎)上,上海交通大学派出了一支23人组成的运动队,经过激烈的竞争,共斩获6金5银3铜的优异成绩,其奖牌总数超过了许多中等发达国家所斩获的奖牌数。